

『和平運動』與汪派投敵（下）

樂 恕 人

抗戰採訪錄第七章

汪精衛決與虎謀皮

一九三五年三月，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急先鋒——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在南京重開自『九一八事變』封閉的南京事務所，派去負責的日本人名叫西義顯，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科；曾任中學教員，後來參加「滿鐵」。他的親兄長名叫西義一，是日本的陸軍大將，中日大戰前二三年，曾任陸軍教育總監和東京警備司令官等職。可是西義顯却是一個澈頭澈尾愛好東方文化，希望中日兩國真正親善友好的平凡人。他對日本軍閥的侵略中國，背後常常發牢騷，罵他們是「無責任、無廉恥、愚劣、驕蠻的下等動物」，因之，這位平凡的『親華派』，常常在幻想着有無可以對中日大局彌補轉寰的可能。

西義顯到南京之後，在公事和交遊方面，很自然地結識了吳震修，一談之下，相見恨晚，很快的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尤其是在談到中日問題時，他們更發現彼此志同道合。

那時期，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先生的重要幹部唐有壬是次長名義，實際上負責外交部的部務。外交部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通』高宗武担任亞洲司長，下面第一科科長是董道寧。

中國那時期的外交，主要在對付日本。自然，亞洲司，和其第一科，正是直接辦對日外交事務的主要外交機構。因之，西義顯經吳震修的介紹，也認識了唐有壬、高宗武和董道寧這一關係的人物。唐有壬因為是中國銀行總行調查部長出身，經汪精衛拔擢為外交部次長，所以唐吳二人之間早是同事，因之在南京他們時有來往。這一個小型中日友好組織，在日本方面，由西義顯的關係，又增加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日本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滿鐵關係的伊藤芳男等人。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典禮攝影時，當時復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為暴徒孫鳳鳴冒充攝影記者，向他連

發三槍行刺，汪身受重傷，但未致命；於是他辭職赴歐洲休養；行政院長由蔣委員長兼任，張羣出任外交部長，唐有壬在十二月九日也辭了職，十二日在上海遇暴徒行刺斃命。

到此為止，汪精衛、黃郛為首的政要，執行汪氏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遂告結束。但這一系列下的高宗武、吳震修等，和日本方面的同道，聯絡依然存在，一直時有聚談，但以『人微言輕』，當然對大局不會有影響。

可是，中日間戰爭爆發，而且相持一年多以後，這一個中日私人集團却竟發生作用，影響了大局的另一面發展，實非任何人所能料及。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在攻下我首都南京，再度委託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謀和又遭拒絕後，近衛首相惱羞成怒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荒謬申明。但敵國遭遇國內外情勢的不利，仍然不得不另闢途徑，亟於把陷入中國戰場的泥腳拔出，以便『北進』策應德義圖攻蘇聯；『南進』驅除英美，妄想獨霸遠東。

於是近衛內閣改組，由陸軍大將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暗地聯絡在漢口的新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力謀停戰媾和。

近衛荒謬申明發表後的一個多月，在二月十五日，敵國長崎港口到了一位神秘的中國客人，在西義顯、松年重治、伊藤芳男的聯絡陪伴下，這個從漢口經香港到長崎的中國客人，正是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董究竟奉了誰的命令而去？抑或到香港有公幹而為在南京時代日本那批志友的引誘？到今天還是一個謎，可是他却是中國官員在戰時第一個秘密進入敵國的先鋒人物。

董到了東京以後，即秘密訪問了敵軍參謀本部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和謀略課長影佐禎昭上校，探詢了日本陸軍內部對戰爭的解決有無誠意？並試探日本政府在何種程度或方式之下，才可以

變更近衛申明的立場？三月五日，董才離開東京，十日乘船到了大連，和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會談，再乘船返抵香港。

這時，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亦以搜集敵情為名，從漢口到了香港，與南京時代日本友人西義顯、松本重治（已調升同盟社華中南總局長）、伊藤芳男三人，會晤着剛由日本秘密訪問到港的董道寧，交換意見後，高董二人才回到了抗戰重心地漢口。

四月中旬，高董再到香港，又與前述日人會面，對中國方面抗戰決心和態度有所闡明。下旬，西義顯回東京，向參謀本部有所報告。其時，日本陸軍中的急進派已發動進攻徐州打通津浦路的作戰，日本方面對「和議」不能有明確答覆。五月中旬，西義顯從東京又到香港與高宗武會面，勸高到東京一行。高回到漢口，得到中央宣傳部部長周佛海的同意後，在七月五日從香港乘船到達日本。

高宗武在東京住到二十一日，其間陸相板垣征四郎大將，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參謀本部新任軍務課長影佐禎昭上校、支那班長今井武夫上校會談，交換了對「停戰媾和」的意見，甚至有原則性的條件等。當時，日方曾向高表示，近衛首相所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申明，不便取消；因之，希望不太主張作戰而又在過去和日本辦過多年

外交的汪精衛出面來斡旋和平。

高在東京時期，由松本重治的介紹，同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公子犬養健相識，那時他僅任職遞信省（現時改為郵政省，即如我國行政院的交通部的一部門）的參與官，官階雖小，可是因為乃父的關係，同政界人物頗有往還。高曾向犬養表示中國亦極願言和，但「不被國內責罵成『漢奸』為前提；中國所願接受者為光榮的和平。」

派高宗武潛赴東京

高宗武離日前，影佐禎昭特別鼓動高回國後，誘致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與日本謀和。可能是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對中國謀和路線立場不同，所以高秘密留東京半個月，竟不曾與宇垣外相會面。但是，外務省內力主停戰媾和的石射東亞局長，則知道影佐進行誘勸汪精衛的謀略，石射未予支持，而且認為愚不可及；因為他認為汪精衛雖為國民黨副總裁，但無實力，領導對日抗戰的是蔣委員長，不是汪精衛。

高宗武從東京回國後，一時消息渺然。日方所能取得聯絡的，是國民黨駐香港代表梅思平。一直到武漢快撤退前，梅在十月二十一日，從香港回到重慶，同汪精衛、周佛海連日會商後，在十一月七日才回到香港。據梅回到香港後向日方人員表示，汪精衛已決意同日本謀和，並決定以高宗武、梅思平為汪的代表，進行談判。高梅二人在十一月十二、十三兩日分別從香港到了上海，先同今井武夫接洽，日方已派定影佐禎昭、今



汪精衛穿不倫不類的偽海軍上將戎服，檢閱偽海軍時攝。

井武夫，及犬養健爲代表，影佐和犬養在十九日從東京趕到上海，雙方正式會談則於十九、二十日舉行，這便是日本紀錄上所謂的『重光堂會談』。

會談草案先由高梅與今井洽商後，今井特別趕回東京，得到參謀本部同意，才和影佐到上海，參加『重光堂會談』，簽訂所謂『日華協議紀錄』，其要點如次：

第一：日華兩國爲排除共產主義，自侵略的各種勢力中解放東亞，爲實現共同理想而建設『東亞新秩序』起見，相互秉持公正的關係，規定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種關係，實現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應密切鞏固團結。

(一)締結日華防共協定，以日德義防共協定爲基準，日本軍隊駐屯防共，劃定內蒙爲特殊防共地區。

(二)中國承認滿洲國。

(三)中國准許日人在內地有居住營業的自由，日本可以撤除治外法權，並考慮交還租界。

(四)日華經濟提攜以互惠平等爲原則，日本可得優先權，特別是有關華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給予日本以特別的便利。

(五)中國如對因戰爭而遭損害的日本僑民予以補償，則日本放棄戰費賠償的要求。

(六)協約以外的日本軍隊，俟兩國和平恢復後，開始撤退；但爲中國內地治安回復起見，日軍撤退以二年內完了爲期。

第二：日本政府發表右列時局解決的條件時

，汪精衛及其同志應表明和平立場，爲建設『東亞新秩序』起見，申明日華提攜等反共政策，再俟機樹立新政府。

此種由汪精衛私人與日方擬議的所謂『和平條件』，較之十日後(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御前會議』所決定『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較爲寬泛與溫和，因爲影佐、今井當時還得到汪精衛的一個陰謀的誘惑，所以極力主張不能過於苛刻。

原來，汪和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主和人物在重慶會商時，竟然異想天開，擬好一個樹立中國西南獨立政權的妄想方案，日軍部居然認爲可能實現，所以將謀和條件放寬，竭力鼓動汪精衛採取行動。

所謂西南獨立政權的方案，即在汪與日方交涉成功時，由汪號召同志陳公博周佛海等，同往昆明，一面公佈日本和平條件，並聲明與重慶國民政府斷絕關係；再由昆明經越南河內前往香港，再正式申明爲收拾時局，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此時，爲呼應汪的申明，雲南必然反戰獨立，四川亦將繼之。雲南省主席龍雲及四川、貴州各軍閥必然反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繼續對日作戰，『起義』響應和平。以雲南四川貴州三省爲主，再由日本自廣西廣東佔領區撤退，即可在滇、川、黔、桂、粵五省樹立西南獨立政權。

汪派此種迷夢，日方軍部竟信以爲真，認爲可以使中國抗戰陣營發生重大分裂，而西南政權將爲擁有實力的親日政權，不同於北平南京兩個偽政府。

但日本『御前會議時』對於汪精衛這種謀略

却表懷疑，故其所擬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與由軍部與汪派所擬定的『日華協議紀錄』，遂有顯著的差異，條件較爲苛刻。

於此可見日本軍人的頭腦比較簡單，而日本政客們又較爲狡猾深沉。但我們亦不能不承認，日本特務軍人如影佐、今井等，竟發生了重大作用，將汪精衛一派勾引脫離抗戰陣營，造成以後的重要變化。

在敘述汪精衛受了所謂『重光堂會談』所協議而又爲日本參謀本部所同意的『日華協議紀錄』所迷惑，決心經重慶逃出，主張和日本談判和平前；敵人曾經多次試探停戰媾和，其中重要交涉，已如前述。

保衛大武漢時期，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一直堅決表示對日方不妥協；日方直接或間接的談和建議，委員長從未公開或直接予以答覆。即使是由德大使陶德曼在漢口斡旋的一次，委員長也告訴他，如要承認偽滿，和不恢復『蘆溝橋事變』前狀態，中國決不考慮談判和平。

但在汪精衛就不同了，他從南京失陷退守武漢後，就開始動搖，在暗中即策動與日方的聯絡，並在公開與非公開的場合，表示可以與日本言和。我們前面已記出汪命高宗武潛赴東京的經過，現在再舉出兩事，證明在那時汪已在積極盤算和日本停戰。

汪系人物潛逃經過

一件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漢口中

央銀行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因該會主席蔣委員長正在南京佈署拱衛首都的軍事，會議由汪主席，出席人員有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人員有陳果夫、陳布雷、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秘書長張羣、秘書主任曾仲鳴。

這一次會議，主要是聽取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德國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之託，並奉到德總統希特勒之命，向中國政府斡旋和平，轉達日本所提出的停戰條件。

會議中，各人都有意見發表，對日本所提條件，有堅決反對與部份同意者。但汪主席討論時，積力主張向蔣委員長迅速報告，應趁此機會與日本談判和平。

另一件事是十月十二日，當武漢外圍戰事緊張劇烈的時候，汪精衛接見英國路透社記者發表有關和平的意見道：

『如日本所提出和平條件，不致妨礙中國之生存，吾人當予以接受，作為討論之基礎。捨此而外，任何人皆無調停之餘地。一切以日本所提出之條件如何而再作討論。』

汪在『保衛大武漢』緊張關頭，突然發表這種考慮緩和的意見，當時曾引起政府內部重大的反響，中央和地方軍政領袖，贊成與反對，議論紛紛。可見汪那時已對和談在表面作間接的主張，而在暗中已作積極的活動。

武漢失守後接着發生『長沙大火』的大悲劇，汪更直接表示反對『焦土抗戰』政策，並對游擊戰之擾民又表反對。總之，汪當時已充分動搖

，反對繼續抗戰的心情和態度，已逐漸公開顯露出來。

十一月十三日，中樞在重慶所舉行的『總理紀念週』集會上，蔣總裁發表徹底抗戰的態度，大意謂國軍已退守各戰區山岳地帶，對防衛敵軍進犯，轉趨有利態勢，我國抗戰前途，益見光明。為了繼續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在我全國一致團結下，任何強敵皆不足畏。

蔣委員長的談話，一面是對敵國近衛首相和軍閥們的強硬表示，另一面也是教訓國內抗戰意志薄弱的政界人士，特別是針對主和的汪精衛，予以忠告。

十六日晚上，也就是汪精衛逃離抗戰陣營從重慶飛到昆明的前兩天，汪在連晚同蔣委員長兩人私下討論國是後，那一夜更有激烈的爭辯，汪曾非常激動的向蔣委員長說道：

『國家民族已面臨滅亡的境地，國民黨應負責任，我們一齊辭職，向天下謝罪好了。』

當時蔣委員長對汪也很發怒，回答他道：

『我們辭職，誰來負國家的責任？』

當時，汪派謀和的重要幹部是周佛海、梅思平、曾仲鳴等，同汪關係最深的陳公博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臨時來不及聯絡，而且陳又曾到重慶與汪精衛夫婦討論過謀和大計，婉言相勸，始終不予贊同，所以汪本人決心離開重慶，只有曾仲鳴同行。周佛海和陳公博是汪夫婦走後才跟着跑到昆明去的。

關於汪夫婦如何能逃離重慶？頗有一綫的必需要。汪既決心走，而且又有過向日方提出的『西

南政權』計劃，首先想去遊說的是雲南省主席龍雲；同時為了那時的交通情況，出國最便利的途徑是從昆明到越南河內。因之，汪即密令交通部長彭學沛為他預留三張飛往昆明的機票。彭學沛其人，在政壇上是屬於汪的『改組派』，因而汪令留機票，他自然遵辦，並且把三張機票送到汪公館，彭也不知是誰要到昆明。

到了十八日飛機起飛前，汪夫婦和曾仲鳴才趕到機場。戰時，各機場港口車站都設有檢查所，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為我國情報保安機構）派員常川駐守。檢查所人員雖然奉命對政府人員來往都有權責檢查，但對地位崇高的汪副總裁，却不敢過問。而且在戰時飛機為了保密，以免有遭受敵機襲擊的危險，所以何時起飛，有何乘客，向不對外發表。汪夫婦和曾仲鳴照計劃在起飛前趕上飛機，檢查人員既不敢盤問，又來不及向上級請示；同時，那天蔣委員長又因公出巡，到了成都，不在重慶。所以汪夫婦等得以從容順利飛離重慶，平安抵達雲南省會昆明。

汪夫婦逃離重慶的旅程如此，後來已成公開的事實。至於陳公博、周佛海等附和汪的重要幹部，何以能在汪夫婦走後，分別從重慶成都趕到昆明，則其詳細經過，至今還是一個謎。

龍雲與汪精衛間

汪精衛到昆明後，最重要的事即為煽動雲南省主席龍雲參加他所發動的『和平運動』。龍雲

在表面上對汪等非常客氣，禮貌和招待極其親切，但對於參加和平運動以及籌組西南政權大問題，任憑汪夫婦鼓其如簧之舌，他深明抗敵大義，絕不動心，表示如此嚴重抗戰時期，和戰大計，必須要和蔣委員長請示後才可定奪。汪夫婦出馬不利，西南政權迷夢頓成泡影；因為龍雲如果忠於政府，不響應汪精衛談和分裂運動，那麼四川各地的軍人更沒有可能。所以汪夫婦在與龍雲一席午飯後，即在非常失望中，繼續飛往越南河內。龍雲在很禮貌地送走汪夫婦和曾仲鳴後，立即以秘電報告中央。在後來幾天當中，汪派主和幹部陳公博從成都飛往昆明；周佛海、林柏生等另從重慶飛往昆明，居然還是受到龍雲很有禮貌的接待，並得自由前往河內，追隨汪求和而去。他們竟然在汪出走後，都能一一離開崗位，逃出抗戰大後方，未曾受到檢查站人員的扣留，又被龍雲接待送走，中國政治之妙，當年此事之奇，至今令人不解？

汪精衛逃出抗戰中國的新聞，頓時驚動了世界，特別是在等候中的敵國。近衛首相早接到今井武夫的報告，說汪在八日左右可以離開重慶，不料汪竟遲了十天。

汪夫婦和陳公博周佛海等在河內連日會商後，通過影佐和今井，要求近衛重發申明，藉以解消是年一月十六日所發『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申明，以利停戰媾和的進行。

近衛在十二月二十日，經過內閣五相會議的討論後，從新發表『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申

明』，即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藉以引誘中國停止抗戰，與日本言和。

近衛新申明的內容，主要即根據『重光堂會談』所簽訂『日華協議紀錄』，但有一重要不同之點，即對原所擬讓日本在二年內撤退非防共區域駐兵一項，竟未提出。

近衛發表此一申明後，以為既已變更『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立場，仍然恢復願與中國政府談判和平，而且汪精衛已到國外主持和平談判，重慶方面可能願意進行停戰交涉。殊不知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對日本誘和不予理會。蔣委員長在二十六日針對近衛三原則申明發表重要談話，嚴加駁斥。大意為日方所謂善鄰友好，是要以中日『滿』結合為一體，而由日本控制，並要我承認偽滿帝國。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承認日本在華北駐兵。所謂經濟提攜，是要日本人在中國內自由活動。其所宣傳之『東亞新秩序』即自居於東亞的主人翁，而以中國及其他國家為其副庸。

蔣委員長並強調中國抗戰目的，在恢復領土主權的完整，行政的自主獨立；不達此種目的，誓不終止抗戰。

蔣委員長義正詞嚴表示抗戰立場後，敵國內閣又受到莫大的打擊，知道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絕不因日方的誘和，以及汪精衛的主和而動搖。於是只好把希望寄託在汪身上，盼其積極謀和，分化瓦解重慶的抗戰政府。

於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不顧一切竟

然在香港發表致國民黨中央的通電，主張根據日本近衛首相的三原則，停戰媾和。因為二十九日這天，在電報上簡稱爲『艷』字，所以汪精衛這次通電，就是當年有名的所謂『艷電』。

從這次通電內容可以看出汪的頭腦會那樣單純，居然就相信了日本的誠意；而又可以看出，他的謀國態度淺薄衝動；以汪精衛數十年革命從政的經驗，想不到他對國家和戰大計，其態度之不冷靜，眼光之不銳敏，思慮之不週密，一至於此；宜其一失腳遂成千古恨了。

汪發表艷電之後，受到日方的催促，認為重慶已無意言和，只有由他出山另組織政府談和。可是，汪等那時有兩種顧慮，尚不敢立即決定出組政府與日本合作。他們所考慮的：

第一，『重光堂會談』時，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自炫，如果出國主和，可以造成西南政權，擁有西南附和將領所統率的十至二十師的武力。和國民黨中央委員若干名參加的政治力量。那知西南政權迷夢破裂，軍政實力份子，除汪派少數幾個人和周佛海參加外，其餘都反對他。如果即與日本合作，另組政府，毫無地盤實力，恐怕連北平南京兩個偽府都不如。汪精衛及其講和幹部，有苦難言。

第二，近衛三原則申明，雖係根據『日華協議紀錄』而來，但是對近衛所稱『日滿支協同一致』，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詳細情形還不明白，所以也還有猶豫，不敢貿然即說完全同意。

有此二大考慮，汪派在當時意見分歧，一部

份勸汪出遊歐洲，不應立即到日軍佔領區組織政府；另外一部人則主張汪可以先到上海，與日本進行談判。汪當時思慮之後，自己決定暫留河內，要陳周等先往香港，與日方繼續接觸，兼看局勢發展，決定最後態度。

回頭再說國內，自從汪的艷電發表後，從國府林森主席到一般庶民，無不痛恨汪精衛敵求和，全國輿論沸騰，各地報紙一致猛烈抨擊汪等賣國；三十五名高級軍事將領，聯名致電蔣委員長，指責汪氏破壞抗戰。

蔣委員長主持國政，不願抗戰陣營分裂，助長敵人的侵略，減低抗敵的力量。所以在汪發表通電後，曾經在翌年的二月中旬，派中央委員谷正鼎前往河內，勸汪鄭重再考慮，並希望汪放棄一切謀和工作，仍然回到重慶，共謀國是。谷正鼎在政界與汪極有淵源，所以委員長要他去代表中央勸汪懸岩勒馬。汪不悔悟，表示他僅是向中央建議自己所認為的謀國之道，既然與中央建議，採納與否，他亦不可能勉強；也希望中央不必勉強他的行動。如果中央決不考慮言和，而要抗戰到底，那麼，他願與幾位同志前往法國休養一個時候，研究歐洲情勢，並察看英法有無利於遠東局勢發展的轉變。一旦情勢許可，他仍然可以回國效力。所以他希望政府發給他們一批護照，以便去法。谷正鼎回重慶向中央報告後，中央又派他在三月中旬，再度前往河內，把出國護照交給汪等，還帶去一筆政府發給的旅費，旋於三月二十日飛回重慶。

形勢至此，汪已決心去歐前夕，愛國志士以

其脫離抗戰陣營，影響士氣民心，激於義憤，遂有河內刺汪之舉。

河內鋤奸誤中副車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汪夫婦等在河內所住的高朗街二十七號朱培德公館內，突有刺客數名在午夜踰牆而入，向大房內開槍射擊。適逢汪夫婦並未住在正房，而居側室，正房住的是汪的親信曾仲鳴夫婦；刺客用手提機關槍向正房掃射，曾仲鳴身負重傷，其夫人受傷較輕，同時倒臥血泊；在隔壁的汪夫婦反而倖免於難。

刺殺案震驚寰球。敵國內閣在刺殺案發生的第二天，接到詳細報告後，立即召開五相會議，決定命令影佐禎昭上校從速將汪夫婦從河內救出。以免可能再發生被刺的危險。影佐奉命，約同衆議員犬養健、軍醫中校大鈴、憲兵中尉丸山等，即從香港馳赴河內，裝備好一艘屬於日本山下汽船株式會社的北光丸，一隻五千五百噸的貨船，開赴河內港外的東京灣待命。

經日方派影佐上校去勸他離開河內，以策生命的安全，他夫婦也怕再生變故，遂同意從河內出走，在影佐等的保護與帶領下，化裝乘坐法國小船出境，於南中國海的公海上，再換乘日方專輪北光丸，開往上海。

行刺案未發生前，汪已令所有從國內逃出幹部集中香港待命，同時和日方保持接觸；加上原來在港活動的汪派謀和份子，香港已成他們的大本營。其中重要人物，有原在香港的中央宣傳部駐港代表梅思平，民國十八年創辦的汪系報紙『

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等，（林又兼為負責『蔚藍書局』，原為政府駐港研究戰時國際情報的機構。）追隨汪夫婦逃離抗戰陣營經河內去港的，有前四川省黨部特派員陳公博、代理中央宣傳部部長周佛海、和×××、高宗武、褚民誼、陳春圃等人。

三月中，汪妻陳璧君代表汪去港召集會議後，汪派在港重要聯絡人林柏生在途中遇人行刺，幾乎喪命；所以汪從河內為影佐、犬養等人護送離開前，即以香港治安可慮，不如逕往上海。汪夫婦在當時已狼狽不堪，只好硬着頭皮，到敵人佔領下的上海，先圖安全，再求發展。

五月五日，汪夫婦在日方保護下，祕密到了上海。於是，在港的汪派諸人除陳公博和林柏生二人留港外，其餘都陸續追蹤而去，上海立即變成汪派附敵謀和的總部。

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五日到上海正式籌備偽政府，再到次年三月三十日偽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場，為時竟拖延了將近一年。其中有幾件要事，在此簡略一述，以便看出汪派當年主和附敵的經緯。

在這一年中，國際形勢和敵我國內有了重大的變化和發展。

首先略言國際形勢。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德國於九月三日即發動第二次歐洲大戰，侵入波蘭，英法對德宣戰。蘇聯暫無西顧之憂，一方面於九月十八日與德國狼狽為奸，正式簽訂瓜分波蘭協定；繼又於十一月底侵入芬蘭，行同趁火打劫，赤色帝國主義

的獐獍面目，至此暴露無餘。同時在亞洲一方面，表面上與日本趨於妥協，而對中國共黨則開始支持，協助共黨發展。於是中共在國內對政府不予置顧，加速擴充兵力。

在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美國，孤立派勢力尚濃，歐戰初期，對雙方保持中立，在十一月初成立的新中立法案，尚且准許商人販賣武器與交戰國。

在敵國方面，自從近衛對華三原則申明發表後，中國政府立即予以猛烈抨擊，抗戰態度出乎敵人意外的堅強；又兼美英對近衛所發表的『東亞新秩序』痛加指責與反對；再以德義向日本提議將防共協定強化，改訂三國軍事同盟等因素，日本軍人認為近衛內閣軟弱無力，內部意見爭執甚烈，近衛內閣在汪精衛逃到河內響應『和平』談判後的第五天，竟至突然辭職；由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繼任，外相有田，陸相板垣、海相米內依然留任，近衛退居不管部大臣。近衛在和既不能，戰又不勝的進退維谷中下了台，國內外各方面引為驚異，國內更多不滿；認為他無定見，無魄力，既已對中國一再申明在先，而中國汪精衛元老又復出國響應在後，他竟然馬上辭職了事，認為近衛在國際信義上大為失態，而其個人以首相之尊，如此作風，可謂為『無節操，無責任，無定見』的三無原則，置中國戰場上百萬大軍於不顧，逃之夭夭。

潛抵上海飽受冷落

平沼上台以後，一面鑒於國際情勢的嚴重，一方面國內軍人又咆哮不停，遂對汪精衛赤手空拳的主和並不過於重視。上台不久，與美英的外交愈加對立，五月中關東軍又在偽滿蘇聯國境的諾門坎繼續張鼓峯事件之後，再發生衝突，關東軍又戰敗求和。及至歐戰爆發，國際局勢更緊張複雜，平沼內閣應付無方，在八月底垮台，遂由陸軍閣員之一的阿部信行大將繼起組閣。阿部內閣發表『不介入歐戰，全力解決中國事變』的宗旨。但對中國作戰獲勝遙遙無期戰場愈加擴大，泥腳愈陷愈深，國內財經更加困難，物價高漲不已。四個月後，阿部內閣又在狼狽中倒台，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再由海軍軍閥之一的米內光政繼任首相。

汪精衛在上海，面臨敵國如此狼狽不安的政局，他受到的冷淡和困難，可想而知。

羣奸畢集

汪精衛投敵後與其同夥攝于偽國民政府成立之日，圖中右起第一人着偽軍服者為任援道，第三人係褚民誼，第四人中立者即汪逆嘴臉。



知。

但最重要的，還是在中國對日抗戰的軍事，在困難中愈打愈有辦法，使敵國更加惶恐。

汪精衛等逃離抗戰陣營，附敵謀和，絲毫未曾影響到抗戰的軍事。政府和民間，同仇敵愾，愈見堅定。汪等逃出一

一年之間，敵軍在佔領武漢不久，雖然在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經過猛烈的南昌會戰，損失慘重後，佔領了江西省會南昌，但四月中到五月初，又為我大軍反攻，曾攻下車站，幾乎收復全城，後為敵軍增援固守。敵人在南昌一帶伸張不得，時時受到我軍反攻的威脅。

同時五月初又發生隨縣會戰，在豫南鄂北相持不下。過了幾個月，從八月到十月，敵大軍進犯湖南省會長沙，為我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坐鎮指揮，奮戰兩月，造成震驚中外的

第一次『長沙大捷』，擊斃敵軍二萬上下，敵軍全線崩潰，我抗戰軍事大放光明，全國歡騰祝捷，抗戰情緒更得到莫大的鼓舞。

到了年底，敵軍又在華南的廣西開闢戰場，遂有南寧會戰，造成崑崙關捷報。

敵軍在這一年中，得不償失，我軍愈戰愈強；這是絕對出乎敵人預料之外，也是汪派悲觀論者大驚失色的情勢。敵軍無可奈何，開始以空中攻勢，擾亂破壞我大後方，特別是對重慶加緊空襲，妄圖從另一方面來動搖我政府和人民的抗戰意志。可是敵人空軍軍力究竟有限，而我朝野軍民意志如山，敵人空襲政策，頂多對我有擾亂作用，他們原以為可以動搖我抗戰，再妄想我政府與汪精衛合流謀和，又大大失望。可是，汪精衛已經勢成騎虎，又已經陷入敵人的掌握中，所以他竟執迷不悟，大踏步走上滅亡的途徑。

汪精衛等在上海寄居公共租界愚園路一三六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長王伯羣的公館，上海弄堂像一條小巷，汪等將其他各棟居民遷走，所有重要幹部，全搬去集中居住，由其特務頭子丁默村、李士羣拉攏上海一部幫會的關係，自己建立新特務系統，藉以保護汪等的安全，並進行各種秘密工作，而在外形上表示並非受日本直接卵翼。

汪定居以後，即催促對『和平運動』並不熱心的陳公博從香港到上海。汪過去在政壇上的兩位大將，一個是陳，另一個是退休在香港的顧孟餘。偏巧這兩個人從開頭就不同意他的謀和大計，汪到了上海，顧陳都無意參加，尙留在香港。

汪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助手竟落到周佛海的身上，周全力慫恿汪成立政府，與日本談和。他們的第一步計劃，即是在九月一日，召開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那所特務總部內舉行。

在偽國民黨全會開幕禮上，汪以偽主席身份發表演說，當時他所闡明的三項是：

(一)抗戰不能支持下去，國際形勢始終不利，前途極為悲觀。

(二)日本政府具有誠意談和，中日非和不足以言東亞和平。

(三)抗戰繼續下去，祇有中共得利，將來國家必受中共極嚴重的威脅。

偽國民黨全會閉幕後，汪即與日方積極進行

『和平談判』。日方初期的談判人員，竟不是政府的代表，而是軍部中特務幹部的影佐、今井等；於此可見日政府對汪當時不太重視，不過試試而已。因為日本政府中態度也不一致，政客與軍閥之間早有重大的分歧意見，而軍部內也並不完全一致。日本政府姑且命令影佐等人打着如意算盤，擬具條件，希望如引誘出汪派來一樣，再發生奇蹟，來結束『支那事變』。

汪一方面籌組政府，一方面又夢想着重慶還有停戰媾和的可能；於是一面與日方交涉和平條件，又一面間接影響重慶言和。日方也利用這一個形勢，一面與汪直接談判，希望他們另組政府與日本合作；一面也間接向重慶聯絡，想以汪為工具憑藉，誘迫重慶停戰。

中外雜誌

合訂本已出第一至九卷

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平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捌拾元

精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壹佰元

國內購一至九卷全套平裝祇收六百元（長期訂戶特價五百六十元）精裝祇收八百元（長期訂戶特價七百元）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

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立即寄書。